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庄忠正 著

政治经济学批判：
黑格尔与马克思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庄忠正 著

政治经济学批判：
黑格尔与马克思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 / 庄忠正著. —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300-0383-1

I. ①政… II. ①庄…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1731 号

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

ZHENGZHI-JINGJIXUE PIPAN; HEIGE'ER YU MAKESI

庄忠正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55 千字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0-0383-1

定价：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CKS001）阶段性成果

前 言

自《资本论》发表以来，引起诸多争论，尤其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①的关系问题，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一般而言，学界主要从纯粹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要么认为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要么认为马克思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不可否认，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更是颇有建树。但是，在费彻尔看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所关心的是批判，是为扬弃他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些关系所进行的实践。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它不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如此，“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毕生的真正使命”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②。换言之，对马克思来说，“革命家”这一称谓是“首要性”的，他既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为全人类而工作”的革命家。所以，我们不应该囿于经济学的

① 这里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了与《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相一致，特采用此称谓。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视角，仅仅把《资本论》理解为以“资本”为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一“首要性”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诠释《资本论》。否则，我们既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关系，也不可能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那么它是什么？它是否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正是鉴于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严格地说，黑格尔是确证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的第一人，他不仅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市民社会中那些为政治经济学所一直遮掩的现实对抗，而且意识到存在于物化的生产关系中的商品拜物教的客观方面。在他看来，为了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对抗，挣脱全面依赖的物化的社会联系，必须超越经济社会领域，步入更高级的道德政治国家。虽然黑格尔试图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但他把物化的人扬弃为观念，即“把帽子变成观念”，仍然落入“抽象统治”的窠臼。“抽象统治”使黑格尔和政治经济学结成“神圣同盟”，他只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尽管如此，黑格尔的这一理论贡献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秘密”，而且对其进行了“跨越性批判”，即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既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何谓“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

的主要工作是揭露”，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它不仅变革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而且使其“正立过来”，即不再把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还原成经济学范畴，乃至单纯的事物之间的定量关系，而是把经济学范畴上升为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如果“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那么“批判”的目的何在？对此，卢卡奇指出，“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它的目的在于“让受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沉重”，进而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简而言之，探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道路。

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发现了问题所在。这里的问题既不是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么使用它的人”。更确切地说，马克思的“问题”不仅在于使政治经济学“正立过来”，克服其形上本性，而且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推翻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纯粹的科学认识”，更是关于“人类解放”的“行动”，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

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而且通过“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彻底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这是“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001)
第一节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002)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023)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	(038)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批判	(051)
第一节 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052)
第二节 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的确证	(059)
第三节 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	(066)
第四节 站在政治经济学立场上的黑格尔	(078)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089)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	(090)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演绎	(105)
第三节 资本逻辑的瓦解与共产主义运动	(122)

第四节	诘难与反驳：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政治 经济学	(134)
第五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158)
结语	(165)
参考文献	(168)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正如卢卡奇所言，经济的首要地位不是一切社会的特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对此，马克思指出：“[在古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成最好的国家公民。”^①虽然少数商业民族以财富为生产的目的，但是“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②换言之，在古人那里，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③

这一转变（从“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到“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是如何产生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造成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理论表征，它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④。然而，这一转变不仅使“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的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份，一跃成为商品世界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7页。

②③ 同上。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的统治者和上帝”^①，成为共同体（社会联系）本身；而且使人的依赖关系变成物的依赖关系，造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②。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之所在。

第一节 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

众所周知，“经济”（economic）这个词源于希腊语 *oikonomia*（家政术），它最初是用来指称私人家庭事务的管理。随着希腊思想家把“经济”的范围从家庭扩展到整个城邦，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才出现。但是，经济思想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其成为一门独立的新科学，因为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思想只是作为广义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而存在，“‘经济’只是一种素材，它的用途在于帮助实现哲学或政治上的主张……并不在于真正分析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③严格地说，经济思想一直是政治哲学的附庸，服务于“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成最好的国家公民”。在欧洲中世纪时期，经济思想的附庸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改变。虽然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开始探讨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使经济思想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经济思想依然只是其政治哲学的附庸，并未取得独立地位。

自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现代政治哲学以来，尤其是洛克的“舒适地自身保存”的教诲，人们开始日益强调经济，使政治哲学朝着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在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经济思想发生了哥白尼式的转折，它不再一味地附庸于政治哲学，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③ 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开始关注其自身的问题，如财富的本性等。但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的重商主义“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形象出发”，只是抓住了假象。“……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①很显然，“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在亚当·斯密那里才得以真正实现，他不仅使经济思想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经济科学，“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而且使重心从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使“人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转向“财富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一、从“对死亡的恐惧”到“对过得更好的欲求”

约瑟夫·克罗波西曾指出：“亚当·斯密的重要性在于，他使重心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学”，“虽然亚当·斯密追随了以洛克为代表的传统理论，但亚当·斯密对此传统理论做了重要的改变并创立了有自身特点的理论。要想对近代资本主义做出合适的解释，就必须理解亚当·斯密对洛克传统的改变。”^②这里所谓的“以洛克为代表的传统”主要是指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所开创的现代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激进变更”（radical modification），它拒绝了古典哲学的和神学的传统，把目光降了下来，不再着眼于“人们应当如何生活”，不再追寻一个终极的、人们所渴望的完善状态，而是从“人们事实上如何生活”出发，建构“通达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途径”^③。

我们知道，不仅霍布斯本人以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自居，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376页。

② 转引自〔英〕唐纳德·温奇：《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③ 〔德〕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他的政治哲学视为全然崭新的东西，而且施特劳斯也认为霍布斯是拒斥古典政治哲学的第一人。但是，施特劳斯随后修正了这一说法，他认为，“霍布斯与政治哲学传统的彻底决裂只不过是接着（即便以一种相当有原创性的方式）马基雅维利首创的东西说的。马基雅维利质疑了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其激进程度毫不亚于霍布斯。”^①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古典政治哲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把政治生活的目标定得太高了，把其建立在人类的最终抱负，即享受品德高尚的生活以及建立一个致力于品德完善的社会之上。但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会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② 鉴于此，马基雅维利主张不再着眼于“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而是把目光降下来，从“人们事实上如何生活”出发，建构“通达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途径”；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追寻最好的政治秩序或最好的政治制度以指导德性之实践，而是把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时间里所追求的目标当作政治生活的目标以把握现实生活。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德性的重新解释：“德性决不能被理解为国家为之而存在的东西，相反，德性仅仅为了国家的缘故才存在；政治生活之允当并不受制于道德性；在政治社会之外，道德性是不可能的；……进而言之，政治社会，甚至最值得向往的政治社会的建立并不依赖于机运，因为机运是可被驾驭的，而糟糕的质料也可被改造为良好的质料。”^③ 所以，在马基

① [德] 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 页。

② 转引自 [德]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5 页。

③ [德] 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 页。

雅维利那里，政治问题得到了解决，它变成了设计“细密精巧的制度”的技术问题；国家成了一件人工制品，人们所渴望的完善状态不再是人的自然目的，而是人自由地形成的理想。

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基雅维利式的革命，在他看来，以往的政治哲学传统并未触及事情的根本，无论是在探求真理方面，还是在引导人们走向和平方面都是失败的。于是，霍布斯着眼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把他的自然学说从人的完善的观念中分离出来，并试图从人类最强有力的东西——激情而不是理性——中推演出自然法；在此稳固的根基上，按照自然法逐步建立事实的真实情况（它至今还只是空中楼阁），直至其整体坚不可摧。基于此，霍布斯实现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五大转向，“（一）从君主政体作为最自然的国家形式的思想，转换到君主政体作为最完美的人为国家的思想；（二）从承认自然义务是道德、法律与国家的基础转换到从一种自然诉求，演绎推论出道德法律与国家（从而否定所有的自然义务）；（三）从承认一种超人权威，无论是基于神明意志的启示，还是基于神明理念的自然秩序，转换到承认国家的完全排他的世俗人为权威；（四）从研究过去的（及现存的）国家，转换到自由构筑未来的国家；（五）从以荣誉为原则，转换到以对暴力造成的死亡的恐惧为原则。”^①

从根本上来说，霍布斯所实现的五大转向源于他对人类行为的根源和人类本性的重新认识，即“他特别发现，各种激情就是这种支配人行动的力量。在各种激情之中，他特别重视虚荣、自负与恐惧。指导着这个选择的着眼点，在于激情与理性的关系。或者更确

^① [德] 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切地说，在于各种不同的激情，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或不适合于对荏弱无力的理性加以取代的功能”^①。霍布斯从人类的各种激情中推演出“自然状态”的理论，否认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既然如此，公民社会必定是从自然状态中产生，为了阐明公民社会形成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人的自然倾向，揭示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更加平等，而且平等地拥有相互毁灭的能力。相互毁灭的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最关注自我保存，自我保存源于人最强烈的激情——恐惧，对暴力死亡的恐惧，而欲求能力的平等则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竞争。猜疑进而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这种敌对状态，因为在没有政府统治的自然状态下，人总是相互猜疑，担心别人会剥夺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生命），因而每个人都想征服、压制别人直到威胁自己的力量不复存在。此外，每个人的荣誉感——“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珍视自己，如同自己珍视自己一样”——使他随时都准备反击、铲除蔑视自己的人。正是这三大自然原因——竞争、猜疑和荣誉引起人们之间的纷争，使自然状态变成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中，人最强烈的激情就是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最强烈的道德要求（自然法）就是保存自己肉体的存在。自我保存成为最基本的道德事实：对霍布斯来说，自我保存是人类最根本的“自然权”，不仅正义和公正的概念建立在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而且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就在于它保护和维持每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这一自然权的能力，即只有能适当保存

^① [德] 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6 页。

生命并且能防止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的战争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所以，在霍布斯那里，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然法取代了古典的以义务为中心的自然法，自然法首先被理解为自身保存的权利。然而，和平和生存权的维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霍布斯的社会契约就是要求每个人自觉自愿地放弃为所欲为的权利，只要别人也愿意放弃这种权利；每个人都要受契约的限制，与其他人达成协议，不违抗被公认为最高统治者的那个人或委员会的命令。尽管如此，霍布斯所开启的现代政治哲学使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存成为现代自由国家思想的起点。

不可否认，“在霍布斯本人那里，自身保存之自然正当已经包含了‘身体自由’的正当以及人的舒适生活状况的正当：这导致舒适地自身保存之正当，这个正当，乃是洛克教诲的关键所在。……这个教诲的结果乃是对经济的日益强调。”^①换言之，正是洛克使“对死亡的恐惧和自我保存”转向“对过得更好的欲求”，使政治哲学朝着政治经济学方向发展。

洛克延续和修正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与霍布斯把自然状态视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不同，洛克并没有将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等而视之，他认为，尽管霍布斯把自然状态和战争状态混为一谈，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不相同”^②。很显然，在洛克那里，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和“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在自然法的统治下，和平、善意地生活在一起，享受着自然的自由和平等。

^① [德] 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39 页。

^② [英]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12 页。